

全面剖析世界乱象之根源 深入探究全球秩序之未来

谁统治世界？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 钱 镇 秘春茜 译

Noam Chomsky


Who Rules
the World?

谁统治世界？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 钱 镇 秘春茜 译

Noam Chomsky

Who Rules
the World?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统治世界? / (美) 诺姆·乔姆斯基著; 钱镇, 秘春茜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8
书名原文: Who Rules the World?
ISBN 978-7-5699-2520-3

I. ①谁… II. ①诺… ②钱… ③秘…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
②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5 ②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4756号

WHO RULES THE WORLD? By Noam Chomsky
Copyright ©2016 by L. Valéria Galvão Wasserman-Chomsk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Time-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etropolitan Books, a division of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New York.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7-5274 号

谁统治世界?

SHUI TONGZHI SHIJIE

著 者 |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译 者 | 钱 镇 秘春茜

出 版 人 | 王训海
策划编辑 | 胡俊生
责任编辑 | 周 磊 余荣才
装帧设计 | 观止堂_未氓 迟 稳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0316-516653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30千字
版 次 |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520-3
定 价 |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乔姆斯基是个全球性现象，以美国人身份谈论外交政策，他在这个星球上拥有最广泛的读者。

——《纽约时报图书评论》

用严谨的逻辑，乔姆斯基让我们贴近倾听我们的领导人告诉我们的话，分辨出他们有意漏掉了哪些话。不管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不听他的声音是个损失。

——《商业周刊》

我们怎么成了一个帝国了呢？诺姆·乔姆斯基这个美国最有用的公民，他的这部著作对这个问题作了最佳答案。

——《波士顿环球报》

如果美国走 19 世纪英国的道路，乔姆斯基的解释有可能是未来一百年历史学家的标准答案。

——《纽约客》

对那些想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发现更多的人来说，有个简单的回答：读诺姆·乔姆斯基。

——《新政治家》

前 言

谁统治世界？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确切的答案，因为世界太多样、太复杂了。但是不难看出，决定世界事务的能力是不同的，也不难从中辨认出更显著、更有力的角色。

自二战以来，美国就是世界上实力大小不等国家中的老大，至今依然如此。美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全球性议题的条款——从巴以问题、伊朗问题、拉丁美洲问题、“反恐战争”、国际经济组织、权利和正义及其他类似问题到文明的生存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如核战争和环境破坏）。然而，美国的力量在1945年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后，已经在减小。伴随这种不可避免的衰退，华盛顿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宇宙的主人们”形成的“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分享的，“宇宙的主人们”形成的“事实上的世界政府”这一说法来自商业媒体，是指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七国集团）以及他们在“新帝国时代”所控制的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全球贸易组织。^[1]

当然，“宇宙的主人们”远不能等同于这些大国的民众的代表。即使在更民主的国家，民众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在美国，杰出的研究者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那些经济精英和代表商业利益的有组织的集团对美国政治有实质性的独立影响，而一般公民和基于大众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独立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研究结果“实

质性地支持经济精英统治理论（Economic Elite Domination）和有偏向的多元理论（Biased Pluralism），不支持多数选举民主和多数多元主义”。其他研究表明，处于收入和财富低端的、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和态度并不被他们的正式代表重视，从而被有效地排除于政治体系之外，而处于社会上层的少数人则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长期以来，根据竞选经费的多寡就能对政策选择做出精准预测。^[2]

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所谓的冷漠：不愿投票。不投票现象与阶级所属有强烈的关联。三十五年前，选举政治研究的领军人物沃尔特·迪恩·伯恩翰探讨了可能的原因。他将弃权与“美国政治体系至关重要的特殊性”相关联，这一特殊性就是：选举市场中，社会主义的，即代表劳工大众的政党完全不存在。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因阶级而异的弃权率”，阻碍了得到一般民众支持却与精英利益对立的政策的选择。这样的研究今天仍在进行。详细分析了2014年的选举后，伯恩翰和托马斯·弗格森表示，投票率让人“想起了十九世纪早期”，那时候投票权几乎严格限于有产、自由的男性公民。他们的结论是，“直接的民调证据和常识都证实，大量的美国人现在对民主共和两党都持谨慎态度，对长远前景越来越失望。”许多人相信，几大利益集团控制了政策。人们渴望国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扭转长期的经济下滑趋势和失控的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受金钱驱动的美国两大政党，谁也不会对此采取有效的对策。这种状况，只会加速政治体系的瓦解。在2014年国会的竞选中，这种瓦解已经表现得很明显。^[3]

在欧洲，民主的衰落同样让人震惊。关键问题的决策权转到了布鲁塞尔的官僚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所代表的财政力量，他们对民主的蔑视在2015年7月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他们野蛮的回应“希腊人应该对自己社会的命运有发言权”的主张，这一主张被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这“三驾马车”不讲道理的紧缩政策粉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学家在这种破坏性政策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强化的紧缩政策设定了降低希腊债务的政府目标。事实上，相对于GDP，他们的债务反而增高了，希腊社会被严重撕裂，它还成了漏斗，救助资金来源流入给它提供风险贷款的法、德两国银行。

这并不令人惊讶。阶级战争——通常是单方面的——有漫长、痛苦的历史。在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初期，亚当·斯密谴责了他所处时代的“人类的主人”（*master of mankind*）——英国的商人和制造商，他们曾是“迄今为止政策的主要建构师”，无论对其他国家造成多“剧烈”的影响，他们都要确保自己的利益能得到“特殊关照”（主要是遭受“野蛮的正义”迫害的海外牺牲品，也有许多英格兰的民众）。上一代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给这个经典的图景添上新的一笔。染指者包括越来越具垄断性的来自上层社会的主人们、庞大的掠夺成性的金融机构、受到国家权力保护的跨国公司和很大程度上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首脑。

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环境破坏的不祥的新报告——人们读到下面的消息不会太舒服：“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平均温度上升的速度等于每天向南移动了大约10米。”这个速度“比我们在地质纪录中观察到的多数气候变化速度大概快100倍”。根据另一项研究，可能快1000倍。^[4]

同样可怕的是核战争威胁的增加。见多识广的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相比冷战时期，“现在发生核战争的概率更高”，如今，逃避无法想象的灾难近乎奇迹。同时，大国却在顽固地寻求“国际不安全”的方案，“国际不安全”是中情局分析师梅尔文·古德曼很早就使用的说法。佩里也是要求奥巴马总统“消灭新巡航导弹”的专家之一，这种新巡航导弹是一种核武器，它的靶向定位精度更高、能量消耗更少，它的使用有可能导致爆发“有限核战

争”。“有限核战争”通过常见的动力就能够升级，从而带来绝对的灾难。更糟糕的是，这种新式导弹有核导弹和非核导弹两种变体，因此，“受到攻击的敌人可能假定最坏的后果，并过度反应，启动核战争。”但是，没有理由期待佩里的“消灭新巡航导弹”的建议会被采纳——美国五角大楼计划花费上万亿美元促进核武器系统的快速发展，小国也在按自己的步骤发展核武器，这是在走向世界末日。^[5]

以上，我大致勾勒出本书的主要特征。接下来的章节将探寻“谁统治世界”，他们如何统治这个世界，他们这些做法会把世界引向何处。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说的“潜在的人群”（underlying Population）如何有希望战胜商业力量和民族主义，成为凡勃伦所说的“活着，舒服地活着”（alive and fit to live）。

时间不多了。

目 录

前 言 / 1

一 知识分子责任的回归 / 1

二 恐怖分子想毁灭世界 / 16

三 暴行纪录和历史健忘症 / 25

四 权力的“看不见的手” / 38

五 美国的衰落：原因和后果 / 50

六 美国要完蛋了吗？ / 59

七 《大宪章》，它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 / 74

八 世界停滞的一星期 / 89

九 《奥斯陆协议》：内容与后果 / 103

十 毁灭的前夕 / 114

十一 以色列—巴勒斯坦：现实的选择 / 120

十二 “别人什么都没有”：美国的阶级战争 / 127

十三 谁的安全？华盛顿如何保护自己和法人团体 / 133

- 十四 暴行 / 145
 - 十五 离午夜还有多少分钟? / 160
 - 十六 从没停止违反的停火 / 169
 - 十七 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 / 177
 - 十八 奥巴马的历史性举措 / 181
 - 十九 “恐怖主义的两种理解” / 187
 - 二十 《纽约时报》读者的一天 / 191
 - 二十一 “伊朗威胁论”: 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 195
 - 二十二 末日钟声 / 206
 - 二十三 人类的主人 / 214
- 参考文献 / 232

一 知识分子责任的回归

讨论知识分子的责任之前，应该澄清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谁。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源自法国德雷福斯（Dreyfusards）案件支持者在1898年写的《知识分子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intellectuals*），他们受埃米尔·左拉抗议法国总统的公开信的激励，谴责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和叛国罪构陷逮捕德雷福斯，并谴责随后军方的掩盖。德雷福斯支持者的立场展现了知识分子正义捍卫者的形象，也展现了他们面对强权的正直和勇气。但在当时，他们不被这样理解。德雷福斯支持者是知识阶层的少数人，在主流知识界遭到激烈指责，特别是被社会学家斯蒂文·卢克斯所称的“强烈反对德雷福斯案件的法国学院派的不朽者”中的卓越人士指责。对小说家、政治家、反德雷福斯领袖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来说，德雷福斯案件支持者是“讲坛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另一位学术大腕费迪南德·布吕纳介则称，“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的是“我们时代里可笑的古怪事之一——我们把作家、科学家、教授和语言学家们抬高到了超人的地位，他们竟敢“把我们的将军当白痴，把我们的社会制度当成荒谬的制度，把我们的传统当成不健康的传统”。^[1]

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呢？是被左拉（曾因诽谤和叛国罪被判刑入狱，并逃离这个国家）鼓舞的少数分子？还是学院的大佬？在不同的时代，这个问题反复出现。

两种知识分子

一种答案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持各种立场的著名知识分子纷纷站队，狂热地支持自己的国家。在他们的《九十人宣言》（*Manifesto of the Ninety-Three*）里，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的领袖呼吁西方“请相信我们！相信，作为一个文明的国家我们会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对这个文明的国家来说，哥德、贝多芬和康德留下的精神遗产，与它自己的火炉和家园一样神圣”。^[2]相应的，知识战壕另一侧的人们，标榜自己狂热追求神圣职业，他们自我吹捧。在《新共和》中，他们宣称“代表这场战争的决定性的工作已经由一个可以称作知识分子的阶级全面完成了，对这一阶级的定义应该是全面、宽泛的”。进步人士相信，他们能确保美国介入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在道德裁决之下的，是经过了这个社会思想家们深思熟虑的”。事实上，他们是英国情报部释放的烟雾弹的受害者，他们暗地里谋求“直接影响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思想”，尤其是直接影响那些可能会把和平国家拉进战争狂热的美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3]

约翰·杜威对这场战争的“心理和教育的伟大教益”印象深刻，认为这场战争证明人类——准确地说是“群体中的聪明人”——“能把握人类事务，也能管理人类……刻意地、明智地”以达到他们谋求的目的。^[4]（短短几年时间，杜威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讲坛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公开抨击“新闻不自由”，追问“在现存的经济制度下，大范围地实现真正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还要等多久？”）^[5]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顺从地按惯例行事。与左拉一样，伯特兰·罗素、尤金·德布斯、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些知名人士都被判刑入狱。尤金·德布斯因为质疑总统“战争是为了民主和人权”的论调，

被判了十年重刑；战后，威尔逊拒绝赦免他，尽管后来哈丁总统减轻了对他的处罚。托尔斯坦·范伯伦这个唱反调者被惩罚得较轻。范伯伦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农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可以通过结束威尔逊对工会的残酷迫害来解决，特别是结束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①的迫害。他随即从食品管理局的职位上被解雇。伦道夫·伯尔纳在批评了“仁慈的帝国主义联盟”及其行径后，被进步期刊封杀了。^[6]

赏罚并用自古就是常见手段：谁站在国家一边，为国家服务，谁就会被主流知识社会奖励；反之，就遭到惩罚。

随后的日子里，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被杰出的学者们区分得更加明确。“价值导向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荒谬的怪人，他们构成对民主政府的挑战，至少潜在地与曾经的贵族集团、法西斯运动的挑战一样严重。他们的其他罪过还有：这些危险分子“企图毁损领导，挑战权威”，甚至阻挠政府机构承担“对年轻人的教化”的责任。有些人走得更远，乃至质疑战争目的的高贵性，比如伯尔纳。《民主的危机》对这种否定权威、否定现有体制的做法提出责难。《民主的危机》是自由国际三边委员会的学者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书。卡特政府中的许多人就来自三边委员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新共和》进步派一样，他们也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含义，超过了布吕纳介的界定，包括了“技术和政策导向型知识分子”，这些人是负责任的严肃的思想家，他们都致力于在体制内做制订政策这样建设性的工作，确保对年轻人的教化在正确轨道上进行。^[7]

真正给三边委员会的学者敲响警钟的是20世纪60年代动荡时期的“过度民主”。当时，社会中被动和冷漠的那部分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提出了自己关

① [译注] 1905年6月于芝加哥成立的美国工会组织。

心的问题：少数民族、妇女、年轻人、老人、劳动者……总之，是那些有时被称作“特殊利益”的人群。他们与亚当·斯密所说“人类的主人”不同。这些主人是政府政策的“首席建筑师”，他们追求的“卑鄙的格言”（vile maxim）是“一切只为自己，完全不顾他人”（all for ourselves, and nothing for other people）。^[8] 这些主人们在政治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却没被三边委员会谴责或讨论，大概是这些主人们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就像那些欢呼自己“经过了这个社会更有头脑的成员的深思熟虑之后”，领导国家走向战争的人，他们为自己做出了“道德裁决”。

为了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给国家带来过多负担，三边委员会成员呼吁更“有节制的民主”（moderation in democracy），回到让不该发声者处于消极状态的时光，甚至回到杜鲁门时期的幸福时光。当时“杜鲁门和华尔街为数不多的律师和银行家们联合起来管理国家”，民主因此而兴旺。

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宣称他们秉承宪法的初衷。用戈登·伍德的话说，宪法的初衷实质上是向“更好的那类人”递交权力、限制“那些不富有，出身不好，不杰出的人”行使政治权力，它是“用来制衡当时民主倾向的贵族文献”。^[9] 但是，在麦迪逊的自我辩解中能看出，他的心态是前资本主义的。在确定权力应该掌握在“国家的富人”和“更有能力的那一组人”的手中时，他想象的这类人是“开明的政治家”和“仁慈的哲学家”，就像罗马时期那样。他们应该“纯洁高尚”，他们应该是“智慧、爱国、有财产、独立的人”“他们的智慧能够让他们领悟国家真正的利益；他们爱国爱正义，至少能够为之做出暂时的、部分的牺牲”。他们天分高，将“凝炼和拓展公众主张”，引导公共利益反对民主多数的过错。^[10] 同样的，威尔逊主义知识分子会因行为科学的发现而感到欣慰。1939年，心理学家、教育理论家爱德华·桑代克^[11]解释：

在智慧和对同伴有良好意愿的道德这两者间存在实质性的联系，这对人类来说真是件幸事……因此，我们有能力的领导一般来说是我们的恩人，通常来说，把我们的利益托付给他们比留给我们自己更安全。

这个主张听着舒服，虽然有的人会觉得，亚当·斯密的眼神更锐利。

扭转观念

两类知识分子的区别提供了确定“知识分子责任”的框架。知识分子责任这说法语义不清：它是指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正派人具有的道德责任，利用自身特权和地位促进自由、正义、仁慈、和平和其他情感上关切的事情？抑或是指人们期待知识分子作为“技术和政策导向型知识分子”不去破坏而是服务于领导者和既有体制？因为权力往往会占上风，所以两类知识分子中的后者被认为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前者在国内被摒弃、被诋毁——就是如此。

在敌人那里，两种知识分子的分类保留了，但价值反转了。对苏联，我们蔑视官僚、蔑视技术和政策导向型知识分子，美国人把价值导向的知识分子称为光荣的持不同政见者。类似地，在伊朗，我们尊崇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谴责保卫既有体制的人。在其他地方一般也是如此。

“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光荣的术语就以上述方式被选择性地使用。因为是个褒义词，所以“持不同政见者”不适用于国内的价值导向型知识分子，也不适用于国外对抗美国支持的暴政的人。以纳尔逊·曼德拉为例，曼德拉在2008年才从国务院的恐怖主义者名单上移除，无须特别授权便可以在美国旅行。12年前，在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里，他还是世界上“臭名昭著的恐怖

组织”之一的犯罪团伙的头目。^[12]这就是里根总统支持种族隔离，违反国会制裁的决定，增加与南非的贸易，支持南非掠夺邻国的理由。联合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这些行为导致了150万人死亡。^[13]这只是里根宣称的打击“文明时代的瘟疫”的反恐主义战争中的一幕。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把恐怖主义说成“野蛮回到了文明时代”。^[14]我们还可以加上中美洲死亡几十万人，中东比中美洲还多死了几万，以及其他的“成就”。很少人奇怪胡佛研究所的学者们把这位伟大沟通者（the Great Communicator）^①当作巨人崇拜，认为“他们的灵魂在全国漫游，像个热情友好的灵魂注视着我们”。^[15]

拉丁美洲发生的事情正在被揭露。在拉丁美洲，那些呼吁自由和正义的人不被允许进入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光荣的万神殿。比如，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后一星期，六个拉丁美洲知识分子领导人——都是耶稣会神父，在萨瓦尔多最高指挥官直接命令下掉了头。华盛顿政府武装和训练的一个精英营犯下了这一罪行，留下了鲜血和恐怖。

这些被谋杀的神父没有被当作光荣的持不同政见者来纪念，整个南半球像他们一样的人也没被当作光荣的持不同政见者纪念。光荣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指在东欧和前苏联这些敌人的阵营里呼吁自由的人——这些思想者当然遭受了迫害，但是与拉丁美洲同样的人没太大差别。这种事没被严肃质疑，就像约翰·科茨沃思在《剑桥冷战史》里写的，从1960年到1990年苏联解体期间，“拉丁美洲的政治犯、酷刑受害者、被判死刑的非暴力政治持不同政见者的数目远超过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这些被判死刑的人，有些为宗教殉道，有些被大规模屠杀，这些事件或者得到美国的持续支持，或者直接由它发动。”^[16]

① [译注]里根的绰号，因经常发表政治保守主义观点的演讲而得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人们可能认为“东欧事件”的事件比南半球的更重要。说明它的理由耐人寻味。解释为什么在美国介入外部事务时应该无视基本的道德准则也是如此。根据这些准则，在处理外部事务中，应该把功夫集中在我们能做得最好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要分担所做事物的责任。我们毫无困难地要求我们的敌人遵守这些原则。

我们没人关心，或者想关心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希林·伊巴迪对美国 and 以色列犯下的罪行的评价；我们钦佩他们在与自己国家相关事情上的所作所为，生活在更加自由和民主社会里的人强烈支持这个结论，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有趣的是，在最受尊敬的地方，事实上，人们的实践与基本道德价值截然相反。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战争从1960年持续到1990年，不仅惨烈，而且有长久的历史意义。只需要考虑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与天主教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旨在粉碎1962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发表的非常可怕的邪说。那时候，用著名的神学家汉斯·昆的话说就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迎来了天主教历史上的新纪元”。天主教恢复了圣经教义。在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把天主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因此开始了一场从“被迫害的教会”转向“进行迫害的教会”的革命。拉丁美洲主教接受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邪说，他们采用“穷人优先的选项”^[17]，神父、修女和普通人给穷人带来了福音书中激进的和平信息。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改善美国势力范围内的痛苦命运。

也是在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做出几个关键决策，一个是把拉丁美洲军队的使命从“半球防务”（来自二战的不合时宜的使命）转向“内部安全”，实际上是反对那些昂起头的本国人的战争。^[18]1961年到1966年，小查尔斯·米其林领导了美国反叛乱计划和国内保卫计划。他把1962年决议产生的毫不令人吃惊的结果描述为，美国从宽容“拉丁美洲军队的贪婪和残忍行